

听涛茶舍

Lifestyle

■ 故事

智讨借款

文/宗学哲

我们全家都是工薪阶层，说来本没有什么钱可往外借。但老家的一些亲戚朋友却认为我在“大银行”上班，应当富得流油。

老家有一个初中同学，上学时我们可谓情同手足。一日，他找上门，说自己办了一个小化工厂，急需一笔资金进原料，让我帮着想想办法。我只知如实相告工资收入减少、孩子上学负担加重等苦处，但他说你在银行上班，帮着贷点款也行。我说如今银行对贷款要求非常严格，再说这也不是三天两天能贷下来的，只能看以后有没有机会。谁知他倒有一种穷追不舍的精神，不住地变换借钱的角度：你在城里认识人多，帮着借借也行。并信誓旦旦地承诺只用半个月，等厂子货款回笼了便立即还上。

看老同学一脸的诚恳，再说也是当年好友，话说到这份上，要是不帮忙确实说不过去。于是，我便将预备年底要交房款的3万元积蓄借给了他。老同学感激涕零，挥泪而去。

转眼半个月过去了，老同学却不提还钱之事。给他打电话，他说资金临时周转困难，说下个月一定还。我想，厂子刚刚投产，难处肯定不少，于是我便又耐心的等了一个月。谁知，再次找他时，他又是说了一大堆难处，说再过十天就给我送来……就这样一而再，再而三的推托，眼瞅着交房款的日期马上就到，可还钱的事还是没影儿。

我只好一遍遍地给他打手机，可他却说啥也不接。往办公室打电话，接电话的人一听我是厂长的老同学，便说厂长不在。后来我为这事弄得夜不成寐，早晨不到5点，我就往同学家打电话，铃振了半天，他妻子接起电话，但一听是我，“他……他……”地吱吾半天，说“他出去跑步去了。”我知道这肯定又是撒谎；在农村老家，放着正经活不干，天不亮就出去跑步，那不成神经病才怪呢。

这几万块钱可是我们全家的命呀，就这样泡汤实在不甘心。真是人急了眼什么招都能想出来，几天来苦思冥想，我还真想出了一个“以骗治骗”的“绝招”。

想起了同学曾提出让我帮忙贷款，我便给他发了个快件，说贷款10万元已有眉目，请速带抵押手续前来签合同。你别说，这招比一百遍电话还管用，今天发了信，第二天他就急火火赶到了我单位。并带来一袋红薯，说了一大堆感激和道歉的话。

我说：因为急需交房款，你先把借款还给我，然后马上帮你办贷款，但前提是要用你的五十铃客货车手续作抵押。他满口答应。然后，我到门口的一家储蓄所要了三份空白的贷款合同（各银行都在推销消费贷款，贷款合同可以到柜台领取），让他一本正经的填写了贷款内容，并让他盖了公章，按了手印。见我说的有鼻子有眼，事儿做得一本正经，贷款合同也是真的，再说他说啥也没想到我也会骗人。因此，签完合同的第二天他便把借款还给了我。

这回该轮到着他着急了。我和办公室的同事及家人说，凡是同学找我一律说不在或说我出差了。又过了几天，他诚惶诚恐地来到单位找我。我说，因为你的抵押手续不符合要求，所以没有批准。虽然这是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，但他还是知道：这回是上了我的“当”了。

文/高辉清

去年，我以访问学者的名义在美国过了半年的留学生生活。

来到宾州大学之后不久，我发现中美科技界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差异：在中国从事科研工作的人一般都非常辛苦，却很难出大的成绩；少数人能够作出世界级的成果，却又常常英年早逝——据不完全统计，上世纪80年代以来50岁左右就猝然撒手的中国杰出科学家就达十多个。在美国，虽然研究成果也不大容易，相对中国而言出的成果却容易多了，而且许多都是世界级的成果。更为关键的是，这些取得重大成就的学者一般都还活得又长寿又快乐。我的导师宾大经济系Klein教授（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）现年84岁，每天还要工作8~10小时。而宾大医学院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教授已年过九旬，每天还骑着自行车上班，工作时间更达10小时以上。

大家都知道，美国人推崇个人成功。但并非每个人都清楚，这种成功与国人理解的成功有些不一样。我们常说的成功者往往是指

■ 视点

“农村人比城市人更幸福”的背后



配图/万永

文/傅勇

日前,《2005年社会蓝皮书》中公布的“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”调查结果显示,目前中国近八成居民感到生活幸福,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;幸福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密切相关,而有钱不等于幸福,财富仅仅是带来和影响幸福感的因素之一。

无独有偶。最近一项国家重点课题研究表明,在城市中产阶级尚未成气候的背景下,农村已经有了一个初具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——农民工;而且在城市人疲倦了都市生活而向往乡村田园,以吃农家菜、玩农家乐为时尚之时,农村人整日待在城市人向往的生活中。由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推理,只要城乡居民互换居住地,将会

一举提升社会总体福利。

如上调查研究的结论显然同城乡居民收入、福利水平的巨大落差格格不入。现实是,近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由1997年的2.47倍,持续扩大到2003年的3.23倍。考虑到城乡居民在其他实物和潜在福利上的差距,中国城乡差距可能是世界之最。从购买力上来说,《2005年社会蓝皮书》引用了国家统计局2004年9月底的入户调查数据,城镇每百户家庭拥有彩电133台、电冰箱90台、空调69台、钢琴2.2架、家用汽车2.1辆、移动电话109部……我不知道如果这个调查放到农村,能够得出什么样的数字,但不可否认的是,农村居民更幸福无法在物质层面上得到说明。

为此,有人怀疑调查的可信度,认为农

村地区的样本过小并且可能缺乏代表性。撇开这点不说,假定调查结果是真实的,那么,难道农民的幸福感真的超脱了物质生活吗?恐怕很少有人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肯定答案。那么,应该怎样看待农民的这种“无端膨胀”的幸福感呢?

答案可以很简单,幸福完全是自我感觉的东西,农民收入虽低,但小富则安。联系到2004年农村的大好形势,这似乎更好理解。2004年农村居民整体增收近千亿,其中粮价上涨增收600亿,各种补贴增收296亿,这是近10年来难得出现的一个亮点。因此,农民朋友喜上眉梢、幸福感增加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吗?然而,透视农民自我感觉良好背后的尴尬,足以令人担忧。

农民良好的幸福感反映了农村整体生活水平较低。西方经济理论中有一个相对

“豪宅热”必须降温

和对经济的拉动等方面进行一些分析,我们会发现“豪宅热”对经济发展弊大于利。

首先,豪宅市场的风险是巨大的。开发豪宅无疑有很高的利润诱惑,但同时又需要高投入,并伴随着高风险。豪宅是房地产高端市场的顶尖部分,满足的是极少数人的个性化需求,先不说项目的设计、地段、品质等技术性风险,仅就市场容量而言,其蕴含的风险也不可忽视。支持开发商大量投资豪宅市场的数据是:我国拥有100万美元以上的富人约20多万,富人的金融资产已有7万多亿人民币,这构成豪宅市场潜在的巨大需求。但如果结合国情分析,这个潜在需求是要大打折扣的。据联合国的标准,我国仅是一个刚刚步入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,富裕程度总体上还比较低。改革开放20多年来,中国虽出现了富人阶层,但由于转轨时期的不规范,许多富人的收入来源存在各种疑问。我们且不言贪污受贿、非法经营,仅说偷税漏税就会令不少人坐立不安。不是说中国

富人都巧取豪夺,但确有一部分人的收入存在问题,这些人一般是不太敢张扬和露富的。同时,我国也有不少白手起家、勤劳致富的富人,他们勤俭节约惯了,并不愿意过铺张奢华的生活。因此对我国豪宅的市场容量必须进行客观的预测和估算,不能凭想当然作过于乐观的估计。开发豪宅动辄资金10亿、20亿,甚至更多,其资金来源又多为负债(银行信贷占主要部分),一旦豪宅卖不出去就会把巨额资金砸在手里,不光开发商破产,还会引发大量三角债和银行坏账。笔者在北京亲眼见到不少豪华别墅一片荒凉,不能不对“豪宅热”产生种种担忧。

其次,大肆修建豪宅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。我国资源匮乏,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数的一半。在我国农村,宅基地每户最多不超过100平方米(约一分多地),但建一套豪宅却占数亩甚至一、二十亩土地,稀缺资源被极少数人占有,不仅是极不公平的社会现象,而且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展资源

节约型经济的原则背道而驰。不少开发商被暴利驱使,把宝贵的资金和土地资源用来开发豪宅和高档住宅,而老百姓最需要的经济适用房却严重供给不足。就拿北京来说,2004年7月份推出10000元/平方米的楼盘76个,而同期推出的经济适用房楼盘才只有25个。一面是售楼小姐施展各种手段推销豪宅,一面是普通老百姓排队几天几夜拿号购买经济适用房。稀缺资源的错配和浪费,显然破坏了社会公平,对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是一种伤害。

再次,豪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大。假设消费1套价值4500万元人民币的豪宅(十大豪宅排行榜平均单套售价4602.5万元),除了土地转让金和各种税费收入外,建一套豪宅所增加的就业岗位是非常有限的(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的就业岗位),豪宅一般要聘请国外机构进行设计,所用建筑材料、装潢材料和家具也大部分是进口的,这对扩大内需效果并不明显,反而拉动的是外需。如果用这4500万元资金建设经济适用房,大约可以建170~180套,这对增加就业、扩大内需以及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,无疑要比建豪宅高得多。

判别一种经济行为是否合理,最主要的标尺是要看它对整体经济的发展是有利还是不利,如果是不利的就要坚决抑制。“豪宅热”必须要降温了!

数量经济模型研制工作,如果是放在中国的一些地方,估计也永远发展不起来。当初,他要是在中国申请这种科研立项,只要有一个人说上一句:“数学模型需要严格的假设条件,而经济变化却永远不规范,数学模型怎么能用于做经济分析?!”或者“有效地数学模型必须包含一个前提,那就是历史能够重演,但经济活动却不可能昨日重现”之类的评语,那么他的申请就不可能被批准。

其次,它不太宽容,并充满了功利色彩。在中国,任何一个项目一旦获得资助,则一定要出预定的成果。这就决定我们的科研人员只能从事那些把握性较强、没有多少风险的研究,尤其是那些拷贝型或者缝缝补补型的研究。如此一来,大量低水平科研成果源源不断地被炮制出来,但重大创新的研究项目则几乎没有了发育的土壤。

第三,它不认同平等,与社会其他部门相比,科研部门的官本位现象丝毫不逊色。这就使得我们的科研人员做研究时不仅要承受来自学术上的压力,而且还要消化来自非学术领域的压力,即使从事低水平的科研,需要付出的成本与西方同行相比通常也要高出数倍。

早些年,我们就提出要科教兴国,但迄今为止效果并不太明显。现在,我们也许有必要从科研文化中去探寻一下深层次的原因。

■ 荐书

《西点领导课》

作者:拉里·R·杜尼霍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1月第一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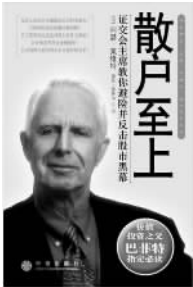


西点军校是美国一所世界闻名的军校,它不仅培养了许多军事人才,更培养了许多各类领导者,有统计显示,由西点军校培养的商业领袖比哈佛商学院还要多。因为西点认为,领导一事绝非儿戏,军事领导者手中掌握着他人的生命。担当如此重大的责任,需要勇气、决断、正直和自我克制,而且每一品德都必须做到最好。

在西点军校,新生从入校起,每时每刻都在学习一门最艰苦的功课:品德。他们学会如何对自己说出的话负责,时刻把组织的需要放在对个人得失的考量之上。西点的行事标准主要有,建立一个尽责的工作团队,克服一切障碍;最大限度发挥每个人的天赋才能;面对危险(压力)保持旺盛斗志;提前演练,随时准备应对危机;通过竞争与合作刺激、提升群体的活力等。(森森)

《散户至上》

作者:阿瑟·莱维特 薇拉·德怀尔
中信出版社 2005年1月第一版



在经过了8年与华尔街巨鳄的猫鼠游戏之后,美国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阿瑟·莱维特,以一本惊世骇俗的《散户至上》,揭露了这个纸醉金迷的名利场无处不在的陷阱。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,告诉投资者怎么样才能把一切掌握在自己的手中:如何正确解读公司财务报告?分析师的建议暗藏何种陷阱?员工股票分红究竟对股东有什么影响?会计师怎样帮企业做假账?公司治理与恶劣的企业文化有何关系?

在本书中,莱维特写出了投资者必须了解的所有事情。其丰富的例证和生动的经验描述及精采的论述,使此书成为每一个证券金融市场投资者避险的利器。(森森)

■ 幽默

代码

股嫂虽然亏了不少,但依然一门心思地钻研各种炒股技术指标和参数,长期抽不出时间收拾家务。一个周末,股嫂觉得挺内疚,担心老公发脾气,就彻彻底底地把屋内打扫了一次。谁料,老公遛弯儿回到家就大发雷霆:“桌上的灰尘哪儿去了?晌午我听收音机发现了一匹大黑马,就把代码用指头记在桌上了!”(李想)

全赖垫背的

小股东电话咨询:“伙计,你们变脸也太快了,就这么几年功夫,圈来的几个亿就折腾光了,成了ST公司?”

董秘答:“这能赖我吗?原先最烂的公司都退市了,本公司惟一的遗憾就是没了垫背的。”(李想)

兜圈子

大户室的一群股民外出,坐上长途中巴车后,车启动出发,不料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。

如此反复多次后,老王有些不耐烦了。客客气气对司机说:“师傅,别兜圈子了,赶快走吧!”

司机连声“是、是、”,可就是不动,呆一会儿,启动了,又是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处。老王正欲发火,同室的刘阿姨赶紧把他拉到座位上。

刘阿姨轻声对老王说:“你炒股多年,这还不理解,人家还有3个座位没有坐满,这就好比庄家主力盘整吸货,不吃饱喝足收集够筹码他能给你把股价拉升推高么。炒股需要耐心,坐车也需耐心!”(胡蝶)